

· 明史鉴今 ·

《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 对历史的反思与学术成就

刘书林

[摘要] 《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一书有许多新分析、新观点，不仅是俄罗斯史学界深刻反思国家历史的一部力作，也得到了俄当局特别是普京的肯定。本书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实现了拨乱反正，如把被西方丑化的苏联还原为“世界上最好、最公正社会的榜样”；把昔日蒙受诽谤的斯大林还原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把以往颇受非议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评价为符合俄罗斯传统文化和当代现实的正当做法；把苏联解体评价为民族的悲剧和西方冷战的胜利；把叶利钦极力推动的私有化改革视为大骗局等。这本书表明中俄两国史学界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

[关键词] 俄罗斯 苏联历史 斯大林

在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苏联历史被西方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发生，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严重损害，俄罗斯发展遇到极大的困难，这引起了越来越多俄罗斯民众的不满。普京执政以来，推行民族复兴、“主权民主”的国家振兴方针，旗帜鲜明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对抹黑、丑化苏联历史和俄罗斯历史的行为亮剑，并取得显著成效。2007年6月21日，普京在接见参加历史及人文社科教学与研究的一线教师时，提出了绝对不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要求。《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简称《俄罗斯现代史》）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版的。

《俄罗斯现代史》是俄罗斯最早体现普京执政新思想、具有初步导向性的历史教学参考书。200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教授等翻译，张树华、张达楠教授总译校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翻译出版速度之快，反映了其时代价值和社会的迫切需求。该书中译本出版10多年来，在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表明中俄史学界、思想界拥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

当然，由于中俄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对历史的看法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这部最初反映普京执政新思想、力图阻止西方历史虚无主义渗透、强调独立自主发展、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教学参考书，仍然值得学术界和关心中俄友好关系发展的人们继续学习和关注。

· 78 ·

一、《俄罗斯现代史》编撰风格独特、形式新颖

《俄罗斯现代史》是21世纪俄罗斯历史学家的作品，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和鲜明特色。

（一）把现代史写到离现实最近的时间点，体现了最大的时间和空间容量

《俄罗斯现代史》2007年出版，载入的历史研究内容则延续到2006年，揭示了离现实最近的历史。这样的编撰风格不但表现了作者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也对读者有着巨大吸引力和现实指导意义。

《俄罗斯现代史》公开声明，其内容“是描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即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的时刻到今天，从苏联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到它悲剧性的解体，从主权俄罗斯的诞生到它已经走过的第十五周年”^①。《俄罗斯现代史》对其设定时间和空间的充实占有，对当代人关心问题的全面分析阐释，表达了史学工作者的诚实和奉献精神，具有创新性价值。把现代史写到离现实最近的时间点，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真正价值。

（二）多种形式和角度的历史资料穿插结合，增强了全书的客观性

为了增强科学性、研究性和客观性，《俄罗斯现代史》采取了崭新的编撰形式。它以综述为主体和主线，大量穿插了“实际情况”“观点”“同时代文献资料”“供思考的信息”等专栏资料。各个专栏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内容翔实的原始资料，显然比单一的综述形式的历史书增强了客观性和说服力，也提高了读者阅读的兴味。

对于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俄罗斯现代史》还设有“供思考的信息”专栏。例如，第一章章末的“供思考的信息”专栏提供了“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争论”专题资料，其中还插入四个“实际情况”专栏、一项社会舆论调查数字图表。第二章最后的“供思考的信息”专栏是“关于‘解冻’和赫鲁晓夫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争论”，其中插入了五个“实际情况”专栏。这些专栏资料打开了人们理解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新窗口，增加了学术性和客观性，使历史画面更清晰生动。

（三）突出俄罗斯现代史的39个重大问题，体现了全书的问题导向性

《俄罗斯现代史》全书共分六大章。六大章下面囊括的39节，实际是沿着俄罗斯现代史的主线，对39个重大现代史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各节标题开门见山，突出了热点问题，其中有“与曾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盟友的最初冲突”“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尝试”“‘老人政治’时期结束”“中苏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危机”“1991年八月政变”“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寡头的冲突”等。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提炼，回应了民众的关注热点。此外，《俄罗斯现代史》各节的内容也体现出全书的问题导向性。例如，该书第四章第23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节指出，戈尔巴乔夫搞总统制的目的是保障自己拥有足够的权力，为强制推行私有化做准备。

（四）挖掘和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扩大历史问题研究视角

从苏共二十大至苏联解体的4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档案的封存，我们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大反斯大林的具体情况不甚了解，特别是不了解党内外对赫鲁晓夫行为的反应。《俄罗斯现代史》运用苏联解体后公开的历史档案资料，提供了苏联人民反对赫鲁晓夫的斗争情况。例如，资料显示“在苏联也发生了抗议‘秘密报告’的示威活动。在第比利斯，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被看作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集会者要求赫鲁晓夫下台，喊出了民族主义口号，后来开始在第比利斯主要街道——鲁斯塔维利大街构筑街垒。3月9日，示威活动被武力驱散，曾有人人员伤亡。两年内，也就是1956年和1957年……有3380人被逮捕，这几乎是从斯大林逝世直到1988年以前因反苏鼓动而被逮捕者总数的一半”^①。

《俄罗斯现代史》还记载了1962年6月赫鲁晓夫残酷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市因涨价而引发的工人罢工事件，披露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表述了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赫鲁晓夫曾大肆抨击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俄罗斯现代史》揭示的新材料证明，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搞个人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全面反思俄罗斯现代史，肃清历史虚无主义影响

苏联解体后，经过十几年的实践积累沉淀，《俄罗斯现代史》对历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全面反思，作出了具有拨乱反正性质的分析与评价。西方许多媒体甚至认为，普京是在为苏联历史“平反”，是“开始脱离西方的轨道”^②。这些说法有一定的道理。

（一）评价苏联为“全世界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

苏联解体前后的一段时间内，苏联的历史和现实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被抹黑歪曲。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满足了各种势力颠覆苏联的目的，使作为苏联主体继承者的俄罗斯丧失了在这个世界上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人民大众不但因社会震荡遭受了生活的艰难，更失去了精神上对祖国的归属感。俄罗斯社会发展面临严重的困难。为了拨乱反正，在普京总统领导下，“俄罗斯社会科学界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③。《俄罗斯现代史》总序言对苏联的总评价为“苏联不能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对全世界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82—83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③（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千百万人们来说，它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①

在《俄罗斯现代史》一书中，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得到充分肯定。“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没有影响战争年代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全部经济和政治势力支撑下，苏联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胜利付出了最大牺牲，做出了那么重要和宝贵的贡献，是有理由期望西方盟友帮助自己重建被破坏的经济的”“苏联作为统一和强大的国家保存下来并显示了最高程度的内部动员和团结的能力。世界已经不能不重视苏联了。苏联消灭了最危险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变成真正的超级大国”“战后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到战前无法相比的水平”^②。

《俄罗斯现代史》充分肯定了苏联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书中提到，1945年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引爆第一颗原子弹。1945年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合情报司令部准备了一份对苏联进行原子弹轰炸的文件。当时人们的共识就是“苏联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来保卫自己”，连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安·萨哈罗夫（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也承认这“绝对必要”。书中引用了斯大林在苏联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向有功人员颁奖时说的话“如果我们晚一年半造出原子弹，那我们可能就得亲自‘尝一下’它的味道了。”^③可见，俄罗斯历史学家对苏联发展战略核武器持认同的态度。

（二）评价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称斯大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自己生身的父亲”。在斯大林逝世后，他却用尽一切污秽之词咒骂斯大林。苏联解体后，重新评价斯大林的呼声日渐升高。《俄罗斯现代史》对斯大林的总体评价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这是自从赫鲁晓夫以后，俄罗斯官方教科书对斯大林的最高评价。该书对斯大林的评价客观公正，其主要思路是“为了能有助于弄清斯大林历史作用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把斯大林放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框架中审视，而且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析。”^④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最为著名的一个评价，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首相温·丘吉尔说的话。丘吉尔绝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死后却留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⑤这就奠定了对斯大林客观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③（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页。

^④（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⑤（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4—65页。

评价的基调。

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特点,《俄罗斯现代史》不主张从执政者个人品质或心理特点的角度来解释,而是主张从俄罗斯国情特别是传统文化视角来进行阐释。书中写道:“在与西方开始了‘冷战’的条件下,对斯大林等领导来说,根本不可能谈到国内制度民主化问题……进一步动员和集中成为对内政策的主要方向。”^①该书还指出,“在俄罗斯国家传统上第一把手的权力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他掌握了所有的资源并使一切政治力量从属于自己。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②。这样的评价显然更具客观性与科学性。

《俄罗斯现代史》基本认同斯大林发展国民经济的赶超战略、经济建设的“强行军”以及集中统一的执政方式。该书指出,“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了加速现代化的公式‘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941年夏天的事件证实这个预测具有充分的道理……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在受到类似严重威胁的条件下,甚至所谓‘温和的’和‘灵便的’政治体制,照例会演变成对实行严厉的政治组织有利的形式,特别是在为保障国家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力方面会更加灵活,正如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所作的那样。通过对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分析便可以断定,苏维埃时期会重复俄罗斯过去所经历的众所周知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由于处于‘被包围的要塞’形势下(既面临外部侵略的威胁,同时又缺少发展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决定的”^③。这一客观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粉碎了对斯大林的污蔑。

《俄罗斯现代史》对斯大林时代严厉的管理和清洗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④斯大林的各种严格要求一般是针对上层管理者,而非基层人民群众,“国内和国外历史学家的研究都确认了1930—1950年镇压的主要受害者正是统治阶层这一事实”^⑤。《俄罗斯现代史》指出,“‘大恐怖’的性质主要针对共产党,甚至连大多数非党人士也一目了然。在那些年代,这些非党人士夜里睡得比共产党员要安稳得多”“斯大林清洗的结果是在资源缺乏条件下形成了适应完

①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②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③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7—68页。

④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1页。

⑤ (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成现代化任务的新的管理阶层即无条件忠实于上级领导和在遵守纪律方面无懈可击的管理阶层”^①。管理的严厉不是斯大林的缺点，为了祖国的生存与发展，他只顾赶路前行，还没有适当的机会研究和运用从容不迫的、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

在对斯大林进行全面分析之后，《俄罗斯现代史》总结了斯大林所具有世所公认的五大成就“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而且某些地方还超过）；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②

（三）超越霸权主义，客观评价苏联对外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环境中，《俄罗斯现代史》坚持把俄罗斯现代历史放进整个世界背景下加以分析，在每一章专设一节对当时的国际关系进行分析与评价。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对国际关系的分析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国主义因素，以俄罗斯与各国的平等关系为基础，这在历史编纂学上开辟了“国情与世情”相结合的新视野，满足了人们了解世界的需要。

1. 苏南关系恶化，双方都有责任

随着铁幕演说和杜鲁门反共计划的推行，美苏反法西斯盟国关系开始分裂。苏南关系恶化则是即将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裂。实际上，这两件事有着同一个根源，即美国统治集团实施的反共政策和遏制战略。

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实际上成为反击法西斯的主力，苏联以极大的民族牺牲承担了击溃法西斯主力的重任。苏联反法西斯的胜利进军，使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利用革命形势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这阻碍了美国战后称霸欧洲的美梦。美国总统杜鲁门趁机打出“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旗号，企图以“马歇尔计划”为诱饵，在苏联与东欧国家中打进分裂的楔子。《俄罗斯现代史》指出，“美国制定的‘马歇尔计划’拟为遭受战争损失的欧洲国家提供援助。但从一开始，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就必须接受所谓‘民主’的条件，而实际上是接受执行反苏方针的条件才能得到援助”^③。“在苏联加入‘马歇尔计划’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就会将这项援助变成仅仅是一种纯粹装饰性的东西。”^④因此，1947年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率领参加巴黎“马歇尔计划”的苏联会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2—73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③（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④（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谈代表排斥出去，并打算按照丘吉尔划定的“铁幕的界限”来“援助”欧洲各国。

美英发动冷战后，斯大林于1946年6月就成立九国情报局一事首先与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Tito）和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Димитров）进行协商，铁托表面上应酬斯大林，实际上热衷于建设由自己控制的“巴尔干联邦”。书中第一次简要记叙了矛盾发展框架“约·布·铁托渴望建立有可能成为东欧新的力量中心的巴尔干联邦……苏联政府对这些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结果导致两国关系断裂。南斯拉夫开始对‘斯大林的代理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答，1949年莫斯科发表声明，南斯拉夫成为‘法西斯党’……南斯拉夫向西方寻求帮助……美国仍然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条约。”^①这就把情况说得比较全面，有利于客观分析苏南关系。人们以往一般认为，苏南关系的对抗是由于斯大林搞霸权主义一手造成的，现在通过阅读苏南矛盾的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情报局有对南共处理过重的错误，那么同时应承认，铁托也应为苏南关系恶化负部分责任。

2. 客观评价匈牙利事件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定性分析，在匈牙利和东欧各国都存在分歧。在《俄罗斯现代史》中，关于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做了客观表述“应当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严厉地批评执政党。情况特别严重的是波兰和匈牙利。”^②而《俄罗斯现代史》把波兰十月事件称作“人民骚动”，把匈牙利事件称作“真正的反共起义”，这样的区分和定性着眼于客观事实。

该书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部原因有两个：“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第二，美国‘自由之声’等西方无线电台公开号召匈牙利人发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并暗示说西方将给予军事援助。”^③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俄罗斯现代史》对事件内容的描述也与实际相符，“1956年10月29日，布达佩斯市委和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大楼被攻占……共产党员被绞死、被折磨致死、被枪决。10月31日，匈牙利反共派头目、红衣主教约·明曾蒂从看守所里被释放出来。伊·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④。

以往我们对匈牙利事件的争议主要在于，到底是继续称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是采纳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③（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④（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10页。

匈牙利反共势力的说法——“人民起义”。现在，“反共起义”这一表述既反映了事件本来的性质，又照顾到各方立场。

3. 揭示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

《俄罗斯现代史》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出卖波兰、逼迫波兰执政党服从西方指引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径。1989年4月，当波兰总统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Witold Jaruzelski）邀请“团结工会”活动家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Tadeusz Mazowiecki）组成联合政府遭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抵制时，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干预，“他（指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克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在戈尔巴乔夫与拉克夫斯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电话交谈中，戈尔巴乔夫号召‘推进民族和解事业’，从而批准了波兰从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过渡。得知华沙发生的事件后，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戈尔巴乔夫驯服了一只虎，想来，他甚至已经在鞭策他了’。”^①

《俄罗斯现代史》还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干涉民主德国的情况，“1989年10月初，在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随后，民德立即发生了大变局”“在柏林会晤时，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他证实，停止国内游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回到莫斯科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戈尔巴乔夫还下令驻东德的苏军（近50万人）不要干预东德国内发生的事件”^②。

4. 认为“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

《俄罗斯现代史》对于苏联解体做了比较客观的记录和分析，并提及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对这一事件的评价“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③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说服力。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④

5. 揭示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是“大骗局”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经把“私有化”作为升入市场经济“天堂”的主要渠道，迫不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82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83—284页。

^③（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④（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08页。

及待的私有化浪潮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和面貌。作为私有化的结局，俄罗斯产生了寡头资本主义。《俄罗斯现代史》毫不含糊地揭示了这场私有化浪潮的非法性和欺骗性。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在1989—1991年期间，自发的官僚私有化就已经开始了。盖达尔政府特别是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从反对官僚私有化转而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①书中引用了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的阿·鲍·丘拜斯（А. Б. Чубайс）在谈到经理私有化时的自白“本质上全民财产被偷窃一空，但这一行为并非非法，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合法的非国有化模式。国家财产大致以两种方式被掠夺：第一种，国有企业的财产被改编为某个新组建的股份企业的部分财产；第二种，经过简单的赎买租赁，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自始至终，所有自发的私有化都是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但想要证明这一点完全不可能。”^②

经过1995年的抵押拍卖及其后来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经济完全落入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美国人手里，“每一年的国家预算都必须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通过。任何独立政策的实施如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意见，国家就面临破产的危机。”^③作为私有化的后果之一，寡头资本主义在俄罗斯产生。

6. 揭示叶利钦的最后检讨和交出权力的真相

一般人对叶利钦的评价是比戈尔巴乔夫更加赤裸的促使苏联解体的人物，而作为叶利钦接班人的普京执行的大政方针却与叶利钦截然不同。《俄罗斯现代史》指出“叶利钦一直未能找到可信的人和相对能够保证叶利钦及其亲信免受司法追究或不经司法程序而遭迫害的人。”^④1999年8月9日，随着斯捷帕申（Степашин）总理被解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被任命为总理，叶利钦公开宣称普京为自己的接班人。普京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叶利钦在这种情况下发表了迎接2000年的讲话，实际上是他辞职的检讨书。

叶利钦在讲话中宣布“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胜任总统的职务。今天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⑤在这种情况下，叶利钦不但宣布提前辞去总统职务，而且对自己在“激进改革”中的所作所为，做了一个检讨。在《俄罗斯现代史》看来，还得加上这一段评价“尽管叶利钦没有在八月叛乱之后马上宣布俄罗斯独立，但他获得了苏联中央政府的许多权力、机构和财产，走上了一个僭位者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叶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16页。

③（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

④（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49页。

⑤（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60页。

利钦走得实在是太远了。”^①

7. 美国霸权主义是美俄冲突的根本原因

《俄罗斯现代史》认为，华盛顿并没有把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当成朋友，原因是“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它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② 美国推出的极富吸引力的关于把西方的技术和资本与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结合起来的意见是无稽之谈、完全不可能实现。美国执政者这种实用主义的欺骗手段严重伤害了俄罗斯人的尊严和基本信任。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北约组织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准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么是否值得摧毁北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③ 《俄罗斯现代史》认为，这是“从彼得大帝开始的，被崇拜西方的民主派自1988年满怀激情地继续的政策失败——是俄罗斯重新被孤立”^④。北约东扩不仅伤害了俄罗斯的民族尊严，而且给俄罗斯国家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西方为了搞垮苏联东欧使用的种种欺骗手法今日再也无法掩饰。这使得俄罗斯境内曾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和叶利钦执政初期的那些亲美势力精神崩溃，彻底失去了脸面。根据社会舆论调查结果，在俄罗斯，对美国的正面评价，1993年是74%，十年之后只剩下了37%^⑤。

三、中俄学者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

苏联解体的悲剧已经过去近30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决定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认识真理的能力。在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坚强领导下，俄罗斯正在破浪前行。《俄罗斯现代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民族精神的产物。中俄两国学者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

第一，弘扬爱国主义。正如《俄罗斯现代史》所说的“今天爱国主义的体裁受到新的重视。这是尊重自己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情，这是对历史、对自己的‘可爱祖国’的爱护态度。很多人把爱国主义与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觉醒，与个人对国家命运和国家文化的未来所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56页。

^③（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

^④（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58页。

^⑤（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56页。

负的责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①

第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个走向繁荣富强的国家，一个能够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国家，绝对不能无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破坏性。“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抹黑国家进步事业的历史，丑化大有作为的执政党的领袖，实际上是颠覆国家政权斗争的一部分。只有恢复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才能鼓舞人民团结奋战，实现民族繁荣与进步。

第三，立足本国国情，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坚持按照自己的国情、民情、世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真理的要求、实践的指示、历史的必然。西方霸权国家把自己的所谓“普世价值”强加于人，纯粹是别有用心、无稽之谈。正如《俄罗斯现代史》所指出的，“俄罗斯所有成功的统治者的突出之处就是，能认清自己国家的特点。俄罗斯两个主要特点是：严酷的气候和彼此很难相连的巨大地域，因此国家就要担负起其应有的作用。国家的作用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俄罗斯的情况下是极端必要的。俄罗斯国家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②。

第四，在对苏联历史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中俄史学家也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虽然由于两国存在客观差异，立场和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本着在研究中尊重实践、探索真理、求同存异的精神，中俄历史学者的共同语言一定会越来越多，并为本国和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刘书林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晏如]

^①（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②（俄）亚·维·菲利波夫《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吴恩远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15页。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acts. But this debate had many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cannot possibly lead to a comprehensive and deep understanding of “whether the socialist system is feasible”. The Austrian school made four theoretical mistakes in criticizing the Soviet model: their criticism was based on a “static vision”; they ignored the dynamic optimizing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y; they ignored the various advantages of a socialist system; they neglected the complexity of the caus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powerful refutation of the Austrian school’s arguments. China’s socialist system ha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t organically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a socialist system with the efficiency related advantages of market economy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s a constantly self-improved constructive system, it demonstrates dynamic efficiency advantages; and its economic system is more conducive to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Poverty Problem in the Transition from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Shi Xiaolin (69)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greatly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The capitalist world witnessed a transformation of “classical capitalist society” into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ety of abundance”. Poverty was alleviated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the apparent abundance of material wealth is only a false prosperity of capitalism at a certain stage of development within a limited scope. The endogenous problem of poverty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t society has not been eliminated; on the contrary, it has become a worldwide problem. Throughout its modern history, capitalist society has always been confined to narrow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has found no way out of the haze of crisis and poverty. Therefore, only after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 can the poverty problem be truly resolved on the basis of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 Insights from History •

Reflections on Histor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Russia* (1945—2006)

..... Liu Shulin (78)

The *Modern History of Russia* (1945—2006) contains many new analyses and new viewpoints. It is a masterpiece of profound reflections by Russian historians and has been positively received by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especially President Putin. It clarifies the confusion on many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For example, it restores the image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n example of the best and fairest society in the world”, which was previously vilified by the West; it restores the image of Stalin as “the most successful leader of the Soviet Union”, who was slandered in the past; it reevaluates the highly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that was criticized in the past as a legitimate practice in line with traditional Russian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reality; it treats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as a national tragedy and victory of the Western “Cold War”; and it regards the privatization reform promoted vigorously by Yeltsin as a big scam. The book demonstrates that the historians of China and Russia have had more and more in common.

[责任编辑: 凯 旋]